



# 物质研究的文化维度

## ——读《瓦尔纳<sup>[1]</sup>与史前欧洲财富的出现》



杜 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科林·伦福儒是著名的英国史前考古学家。著有《文明的出现》(1972)(*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文明之前》(1973)(*Before Civilisation*)、《考古学与语言》(1987)(*Archaeology and Language*)、《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1991)(*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等考古学作品。

伦福儒出生于 1937 年。1956 年到 1958 年期间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其后,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62 年肄业于剑桥大学。1965 年,发表《爱琴海的黑曜石》一文(*Obsidian in Aegan*),其中伦福儒对欧洲和近东地区的黑曜石贸易以及欧洲冶铜技术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基于对传播论研究的质疑,他认为传播论对冶炼技术起源和传播的研究存在问题主要是编年的问题<sup>①</sup>。为了重建史前欧洲的编年,伦福儒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卡拉诺沃(Karanovo)墓葬揭露出青铜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使他意识到“巴尔干的发展序列与爱琴海之间的联系存在错误”<sup>②</sup>,为证明这一推论,他在 1965 年进行了田野调查工作。1968 年到 1970 年间,他主持了希腊 Sitagroi 的发掘工作。1972 年,伦福儒成为南安普顿大学考古学教授。任教期间,他分别对奥克尼郡的 Quanterness 和希腊米洛岛的 Phylakopi 进行了发掘。

在当时,伦福儒对传播论这一主流观点的挑战使其处于一种孤立状态。他在 1973 年出版的《文明之前》也备受质疑,这部著作质疑了史前文化的变革起源于近东并传播到欧洲的假设。伦福儒对文明

起源和发展怀有极大的兴趣,在长时间跨度内考察人类社会是如何变得复杂一直是他所关注的问题。正如他所说,“这的确是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方向性过程,或许这是人类故事中最吸引人的问题之一,我的许多工作最终都指向对复杂社会起源的理解”<sup>③</sup>。

### 一、物质文化与物之于考古学

物质文化研究是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博物馆等多个社会学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考古学,物质研究居于其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sup>④</sup>。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构成了北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基础,直至博厄斯(Boas)历史特殊论的学术转向,物质文化研究才逐渐被“原始”艺术(“primitive”art)研究所取代<sup>⑤</sup>。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文化研究重新得到了文化人类学者的关注,并赋予物质以新的生命和含义。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1986)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反映了新的研究取向,其中阿帕杜莱围绕着交换和价值之间关系试图说明“商品,之如人般具有社会生命”<sup>⑥</sup>。他认为商品是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物”,并且强调欲望和需求是构成商品流通的社会机制。基于对“物品”(object)和“商品”(commodity)关系的思考,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提出了“物品的传记”(biography of object)<sup>[2]</sup>,认为物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和循环应被视为一个整体,仅仅对某一特定阶段的分析无法全面了解物品价值的变化。他引入“独特性”(singularitization)和“商品性”(commoditi-

zation)的概念来解释物品转变为商品的过程,即:物品的独特性赋予其成为商品的资格,商品化过程却削弱了独特性,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流通。其中,物品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属于文化范畴,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价值和意义<sup>⑦</sup>。

考古学自诞生到成为一个专门学科一直将“物”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器物的断代、功能以及器物和物质文化的类型构成了物质研究的主要范畴。20世纪60年代至今,考古学物质文化的研究视角扩大到社会分析,不仅强调物质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并且提出需要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内加以阐释。考古学者们也开始区分“物品”(objects)和“材料”(materials),认为后者不应仅被视为“用以生存的工具”,而是体现并塑造了其制作者和使用者的认同,反映了器物的制造、使用和遗弃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sup>⑧</sup>。

诚如一些考古学者所担忧的,尽管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是物质文化研究,但是有限的考古学材料和狭窄的研究视角难以形成更为缜密的理论模式以分析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因此跨学科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1986)的《瓦尔纳与史前欧洲财富的出现》正是将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该文章被收录在阿帕杜莱主编的《物的社会生命》一书中,他围绕瓦尔纳墓葬中具有声望的物品(如金器和铜器),分析了物品蕴含的象征价值和社会意义。并将瓦尔纳纳入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语境中,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考察了由无差别<sup>⑨</sup>的狩猎社会向相对复杂的早期国家型社会转变的过程。

## 二、文化意义上的物品价值

文化人类学家对物品价值的广泛讨论是基于对马克思有关商品和交换价值研究的反思,以及莫斯礼物交换研究的启发。马克思对商品和价值的研究以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在“生产的视域中看待经济问题”<sup>⑩</sup>。此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术语不适用于对史前“原始价值”(primitive value)的讨论,因为它们无法涵盖“象征性”价值。一些不具实用性的物品并非不具价值,那些具有原始价值的物品虽然缺少实用性,却包含着声望和地位的象征意义,这是难以用“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来衡量的<sup>⑪</sup>。莫斯的“礼物”研究为物质研究提供了另

一种视角,他注意到“礼物”之灵弥补了商品社会性的缺失,它也是使物与人相交融的力量源泉<sup>⑫</sup>,则物不再是被动和沉默的,而是具有生命和灵魂的。因此,若想对物质文化有更全面和透彻的理解,就需要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视域下的商品,跳出礼物/商品以及原始/现代二元对立结构的藩篱。

瓦尔纳地区主要发现了两个墓葬区,分别被命名为瓦尔纳 I 号墓地(Varna I)和瓦尔纳 II 号墓地(Varna II),相比较而言,前者的随葬品更为丰富。瓦尔纳墓葬在欧洲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瓦尔纳金器工艺的精湛和发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其次,瓦尔纳墓葬中已表现出经济上的平等,如村落房屋呈相同规模,发现的一座较大的房屋也有理由被视为“公共性建筑”。直到1982年,据已发表的发掘报告可知瓦尔纳共发现204座墓葬,其中的135座墓葬被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被发掘者称为“象征性的墓葬”(symbolic graves),共35座。其下又划分为:随葬品丰富的墓葬(3座);含有泥质人面面具的墓葬(3座);简单的象征性墓葬(21座);以及包含部分人骨的二次葬墓(7座);第二类是“仰身直肢葬”(59座);第三类是“侧身屈肢葬”(41座)。其余墓葬尚未被发掘或未被分类。

墓葬中存在一类特殊的物品——具有声望的物品(prestigious objects),其价值并不体现在交换或是劳动力,而是它所具有的象征价值。这类物品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类新商品的出现,而应是一种新形式的声望(prestige),或至少是表达声望的新方式。瓦尔纳墓葬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黄金的使用,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中共有2,200件金器,重4,921克。然而伦福儒认为我们不能轻言物品价值的高低,而是需要谨慎考察。他以五点论证了金器在瓦尔纳具有的相对价值:(1)被用以装饰人体两个关键部位,面部和生殖器;(2)黄金权杖或节杖象征了墓主显赫的地位;(3)一些仿制金器的物品,使其看起来更具价值(如M4);(4)较之同样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如铜器),黄金在使用上更为节省;(5)黄金内在属性具有的吸引力,如光泽和不易被腐蚀的特性。

金器或是铜器由于材料的稀缺和珍贵、铸造难度较大而具有较高的相对价值,瓦尔纳墓葬随葬品

中更多的是具有实用性的陶器和石器。同时存在的另一类物品虽然是以普通而常见的材料制成,却可以极明显地识别出它们的象征价值,如在瓦尔纳发现的骨制偶像。这类物品的出现不仅证明了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类具有的局限性,也说明一些商品并被承认具有原始价值(prime value)。伦福儒通过对瓦尔纳墓葬和随葬品的分析,试图说明物品不仅能够反映社会结构,而且一些具有“声望”的物品通过象征性价值表征社会等级。如瓦尔纳发现的儿童墓或婴儿墓,高规格的随葬品显示了他们的地位(M4, M17)。然而,贵重的随葬品反映的并不是儿童或婴儿的地位,而是他们父母的地位。通过对表现在随葬品上的差异性考察,伦福儒认为社会等级主要表现在:(1)随葬品的数量上;(2)高规格物品的数量上,主要是黄金;(3)象征性徽章的出现,如黄金头饰、黄金胸饰以及节杖;(4)不同寻常的器物的出现。

### 三、独特性和商品性： 史前欧洲财富的出现

伦福儒在对瓦尔纳墓葬的分析过程中意识到考古学材料的模糊性难以透彻地了解交换网络以及亲属关系维系的社会,同时也使超越于村落层面或政治群体的分析难以展开。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伦福儒选择了另一条分析路径,即:从瓦尔纳的冶炼技术入手,从而将其纳入更大的社会语境中。一方面,以冶炼技术为切入点,超越了政治疆域以及模糊的族群类别的限制,矿石的来源及其辐射范围勾勒出包含着贸易交换网络的更广阔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他对瓦尔纳、爱琴海铜器时代早期以及不列颠铜器时代晚期进行了比较研究,建构了由无差别的狩猎社会向相对复杂的早期国家型社会转变的过程模式。

伦福儒试图回答:在何种情况下及以何种过程使一些物品集中在精英阶层?贵重物品的占有和展示如何使一个高等级的人实现并维持其社会地位?平等社会如何转变为复杂社会?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典进化论者还是新进化论者都将技术视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其中普遍进化论的倡导者——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将技术变革归结为人类有意识地运用其力量进行发明创造,工具扩展了人们生存和控制环境

的能力。并提出“作为技术阶段的考古学时代”(Archaeological age as technological stages),他认为“青铜时代”以及“冶铜时代”的命名存在误导,因为它们没有涵盖铁器具有的重要意义<sup>⑤</sup>。在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统治者以铺张浪费的葬礼来表现权力。随着这些国家的巩固,继承人的贪婪削减了这项奢侈的花费,上层阶级的埋葬也趋于简朴<sup>⑥</sup>。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作为新进化论的代表,与古典进化论者都承认人类文化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并具有一致性和阶段性。不同之处在于,怀特以能源的获取作为进化的标志,而非食物和生产工具。他视文化为一个整合的、动态的和象征的系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亚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为基础,社会系统为中间,思想意识系统居于最上层,技术系统对文化的进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sup>⑦</sup>。

伦福儒对进化论将更为复杂的经济形态的出现解释为技术革新,以及一些学者将“简单”经济(simple economy)和“复杂”经济(complex economy)<sup>⑧</sup>的两类社会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对新的活动或新产品的广泛接受,并非单纯是出于对新科技进程的发现,我们也应当考虑价值和需求等社会概念。但他吸收了进化论有益的成分,认为进化论有助于在时间范畴内对物质文化进行研究。通常,有声望的物品具有持续性,甚至是永久性的价值,而物品的历史性价值有赖于对物品独有的历史进行观察和研究。

不列颠铜器时代呈现出墓葬形制的变化,集体墓葬(collective burial)中没有出现引人注意的随葬品,而在稍晚时期的墓葬中个体拥有丰富的随葬品。就这一现象,伦福儒引入了吉尔曼对西班牙东南部等级制度出现的分析,个人对具有声望的物品的消费使等级制度合法化。“新的意识形态下的仪式(ritual)并非是建立在社区内集体劳动力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葬礼中对具有声望的物品的消费、与其他地方精英的接触,以及/或通过专业手工业者的活动获得的象征的基础上”。在伦福儒看来“铜和金提供了等级表达的工具和新的交流的途径”,“事实上,它们并不仅仅反映或表达了社会中的等级分类,即使没有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存在等级分类。相反,拥有并展示这些有价值的物品建



构了其所有者的显赫地位,并有助于使他或她更具声望”那么,应视这些物品具有更为积极的作用,而非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

沿着瓦尔纳、爱琴海铜器时代早期以及不列颠青铜时代晚期的发展脉络,伦福儒对三个地区社会发展进程进行了比较。瓦尔纳完全进入铜器时代,铜斧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但是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金属产品的减少,似乎显示了欧洲繁华社会的衰落,并且在瓦尔纳已不存在等级组织。爱琴海铜器时代早期则进入克里特(Minoan)和迈锡尼(Mycenaean)宫殿文明(palace civilization)。但是,直到铜器时代晚期,铜质工具才大规模出现。不列颠青铜时代晚期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金属物品不再出现在墓葬中,并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也不再被发现。

在三个案例中,呈现了结构性或过程性的相似:较早时期对象征性物品的使用,而在较晚时期随葬物品则多为生产性物品,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也更为少见。具有声望的物品的相对缺乏给研究者造成了一种误解,“此时的社会更为贫穷,或等级分化已不那么明显”。然而,也许情形恰恰相反。具有声望的物品象征了较高的社会等级,个体倾向于对此类物品具有所有权作为通向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和占有其他资源的途径。具有声望的物品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文化和社会的象征资本。进入欧洲铜器时代晚期,物品的大量生产使贵重物品的“原始价值”(primitive value)从使用中脱离出来,至少是削弱了它的“独特性”。因此,正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非倒退使物品的独特性减弱,商品性增强,并得以在更大的领域中进行自由交换。此时,可能存在三种重要的关系:(1)商品可以进行跨国境的自由交换,并发展出生产和交换系统;(2)具有较高价值的物品得以流通;(3)显著的社会等级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却非决定性因素。技术的作用体现在它极大程度上保持了新商品所具有的新奇感和吸引力,在一种理想状态下,一件商品的属性是在技术的不断进步中被确认的。高规格商品的缺失并非是由于技术的衰退或社会贫穷,而可能是由于在短时期内技术尚不足以生产大量精美、高规格的商品。

#### 四、结 语

伦福儒对瓦尔纳墓葬的分析堪称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以及物质文化研究新转向的经典案例。物质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的核心范畴,借助于类型学考古学材料被用于区分文化类型并建立编年。一方面,长久以来物品被视为静止、“无生命”的,尤其是在进化论范式下,它们仅仅是社会结构或等级的注释,从而造成考古学研究中“物”与其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疏离。另一方面,基于对马克思“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反思,指出这两个术语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语境下,无法涵盖物品具有的象征价值,对早期社会物品的分析存在缺陷。瓦尔纳墓葬研究强调考古学意义上的器物分析,更强调从人类学角度对物品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并为我们呈现了史前欧洲社会商品流通的动态过程,使物品具有流动上的意义。

在方法论上,伦福儒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和一些有前瞻性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考古学研究有必要拓展研究视角并利用相对缜密的人类学理论模式,只有这样在考古学研究中才可能跳出进化论范式的窠臼。但是,他同样强调了进化论在物品分析中的重要性,相较于微观的某一墓葬或聚落研究,进化论增加了时间的维度,使对复杂社会的起源进行历时性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瓦尔纳墓葬研究的个案中,伦福儒引入“物的生命史”这一人类学概念,以期能够对物品具有的社会价值及其变化过程有所了解,借此来建构无差别的狩猎社会向相对复杂的早期国家型社会的转变。而这主要是基于考古材料局限性的应变之举,因为它们始终难以像民族志般回答一系列问题,如:欧洲史前社会是如何赋予物品以价值的,仪式在物品价值变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物品价值和社会认同等。

瓦尔纳墓葬研究的另一启示在于对无差别的狩猎社会向早期国家型社会转变机制的探讨。一方面,考古学倾向于通过物品呈现复杂社会的转变,但疏于对转变机制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在进化论主流学术话语下,社会转变的机制被归结为技术的发展,它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甚至是动力之源,这种解释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需求。在瓦尔纳的研究中,伦福儒认为复杂社会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因素起着决定作用,这在物品

价值的转变中得到体现。具有声望的物品成为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资本,它在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确切地说是在特定阶层内流通。恰恰是物品的独特性构成了通向较高阶层的途径,需求成为价值变化的重要动力。这在阿帕杜莱看来需求和欲望构成的社会机制使物品“偏移”于原有轨迹<sup>⑩</sup>。同样,伦福儒强调个体对象征性物品的需求,也强调了拥有这些物品对阶层结构的影响,他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分析商品的同时,也注意到技术变革的重要性。技术革新使商品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商品性的增强削弱了物品的独特性,从而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伦福儒尽可能的利用考古材料对“传记”的物品价值进行了复原,更为动态和结构性的探讨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考古学材料难以像民族志文本那样对物品价值的变化以及物品与人的交织进行深层的演绎。

注释:

[1] 此处的“瓦尔纳”(Varna)是指位于保加利亚东北部,黑海西岸的瓦尔纳地区,而非印度等南亚各国印度教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1970年,保加利亚考古学者对瓦尔纳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因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黄金制品而著称。伦福儒对瓦尔纳墓葬的分析依据的考古学材料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的质性研究。

[2] Goden 和 Marshall 对“使用生命”(use-life)和“物的传记”(biography of object)进行了区分<sup>⑨</sup>。1994年,Tringham 首先采用了“使用生命”这一概念,在物质研究中引入了时间概念。后被过程考古学家所采用,以对物品进行历时性分析,即关注物品或器物的隐喻的或功能性特征的变化。与“物的传记”有所不同,“使用生命”立足于考古学视野下的物质文化,强调被制作出来的器物具有有限的使用生命,经过磨损后而被遗弃的物品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物的传记”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不仅包括物品的制作、使用和流通,而且着眼于物品在不同语境内意义的再建构<sup>⑩</sup>。

[3] “egalitarian society”译为无差别或平等社会。伦福儒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平等社会,并且平等也不意味着缺少社会结构,“如果平等主义(egalitarian)一词适用于任何社会,无论是现存的还是逝去的,都不能说明这一社会缺少社会结构”<sup>⑪</sup>。

[4] 伦福儒承认“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别,但是他反对进化者将“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并且他认为“简单”不等同于“早的”(early),“复杂”也不等同于“晚的”(late),因为这种等同无疑会陷入“进化论式的逻辑”中<sup>⑫</sup>。

参考文献:

①、②、③ Richard Bradley. An Interview with Colin Renfrew.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④、⑨ Chris Gosden and Yvonne Marshall.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Objects, *World Archaeology*, Vol. 31, No.2 (1999).

⑤ Mirian T. Stark. *Social Dimensions of Technical Choice in Kalinga Ceramic Traditions*. In Elizabeth S. Chilton ed. *Material Meanin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⑥、⑪、⑲ Ajun Appadurai.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pp.3,10. In A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⑦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⑧ Elizabeth S. Chilton. *Material Meanings and Meaningful Materials*, pp.1. In Elizabeth S. Chilton ed. *Material Meaning: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Utah: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9.

⑩ Andrew Jon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Topic in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⑫ Colin Renfrew. *Varna and The Emergence of Wealth in Prehistoric Europe*, pp.157. In A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⑬ [法]马赛尔·莫斯著,汲喆译:《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

⑭、⑱ Colin Renfrew. *Beyond a Subsistence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Prehistoric Europe*, pp. 91.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Supplementary Studies*, No. 20, *Reconstructing Complex Societies: An Archaeological Colloquium*, 1974.

⑮ Goden Childe. *Archaeological Ages as Technological Stage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74, No. 1/2 (1944).

⑯ [美]布鲁斯·炊格尔著,莫惠旋译:《柴尔德与20世纪90年代的关系》,《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⑰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第2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